

本地制度环境对异质性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研究

吴飞飞 张先锋

(合肥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通过构建总体制度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两个指标来综合衡量本地制度环境,实证分析本地制度环境对异质性企业对外出口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并对外出口,本地制度环境建设可以成为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内生动力源泉;异质性企业出口对于本地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现代制造业企业以及我国东部企业的对外出口行为对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大,本地制度环境建设可以成为促进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根本驱动力。基于此,还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的制度红利。研究结果可为优化本地制度环境、稳步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丰富的政策参考,还可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定路径参考。

关键词: 本地制度环境; 企业对外出口; 制度红利; 企业高质量发展;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 F7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18)04-0040-12

DOI:10.13269/j.cnki.ier.2018.04.004

一、引言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改革”和“市场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需要给予更加深入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而考察本地制度环境对企业出口的内在影响则是深入认识上述问题的重要维度^[1]。自加入WTO之后,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得以参与国际市场并开展出口活动,究其根本原因,主要得益于影响双边贸易成本、企业交易成本、企业研发活动、契约执行效率的本地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2]。十九大报告强调,“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而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能否持续具备出口竞争优势是决定上述目标能否实现的前提和关键,而具有“外部约束”和“外在激励”等属性的本地制度环境将对企业对外出口产生多方面的影响^[1]。

具体而言,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内在机理在于:首先,从企业运行成本来看,对于处于良好的制度环境的企业,其生产运营有着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相关参与厂商能够按照既定规则有序开展相关生产活动,这将显著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中的各种不确定性,交易费用的显著降低引致企业能够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并从事更加高效的生产活动,进而强化企业国际竞争力并促进企业对外出口^[3]。其次,从市场竞争效应来看,拥有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的地区,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更高以及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将“倒逼”企业提升自身竞争力以实现更好生

收稿日期:2017-11-28; 修回日期:2018-05-15

作者简介: 吴飞飞(1988—),男,安徽蒙城人,经济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区域经济;张先锋(1968—),男,湖北兴山人,经济学博士,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7YJC79016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6JZD01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JZ2017HGBZ0959);合肥工业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JYYB1716)

存和发展,并有助于强化该地区企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4]。第三,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来看,如果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越高,企业研发成果的市场回报越高,企业研发投入越能够得到外部制度激励,企业自身创新能力也会因研发投入的增多而得以增强,这将有助于强化企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5-6]。因此,可以初步推断,总体制度环境效率更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更高的本地制度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和形成,进而促进国内企业成长为出口企业。然而,目前研究主要从总体出口或者行业出口等视角来研究“制度与贸易”之间的关系^[7-10],从微观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针对性考察的文献仍然较少,而且更为细致地考察异质性企业出口对于制度环境的敏感性的文献更少。对于上述问题的微观考察,可以挖掘以往文献无法捕捉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于微观企业对外出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这一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中的差异化特征。

基于此,本文构建总体制度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两个指标来综合反映我国省份制度环境水平,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并比较分析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所表现出的差异性特征。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从微观视角实证分析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对企业对外出口的经验影响,并从企业高质量发展视角探讨本地制度环境优化成为我国出口优势重塑的内在驱动力的可行性,这可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生产分工中寻找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内生动力来源提供新的思路;第二,深入考察不同层面的本地制度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影响,这可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主动出击”和“顺势而为”实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自进入 21 世纪以后,制度环境对一国总体贸易、行业出口等影响的研究逐步丰富起来,其中一类重要文献是从制度角度研究比较优势的新源泉问题,“制度比较优势”被逐步提出并得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1-7-10]。从契约制度的视角,Acemoglu *et al.*^[11]理论研究得出,拥有不同契约制度效率的国家将产生差异化的内生比较优势,处于不完全契约制度环境下的企业将会选择落后的生产技术。从金融制度的视角,Manova^[12]指出,金融发展对出口的影响远大于其对产出的影响,金融更发达的经济体拥有更丰富的出口产品种类和更多元化的出口目的地。此外,Levchenko^[7]、Nunn^[8]、Costinot^[9]分别从契约依赖度、专属性投资和生产复杂度的角度来衡量和定义行业属性并均研究得出,高契约制度质量有助于促进高制度依赖性行业对外出口。Nunn and Trefler^[1]则明确指出,国内制度质量是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以 La Porta *et al.*^[13-14]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理论还指出,一国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一国金融水平的发展,而由金融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国际化至关重要^[15]。金融契约水平上升将加速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和降低高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并将促使银行将信贷资金配给到高生产率企业,从而减少资源误置并提高企业的总体生产率^[16]。这说明,制度效率提升可以强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减少资源错配现象。

在国内研究中,李坤望和王永进^[17]从我国省际层面的契约执行效率角度研究得出,拥有更高制度质量的省份在契约密集型行业和制度依赖型行业上出口份额更多;黄玖立等^[18]考察了经济特区的制度优势并得出,设立经济特区的城市在契约密集型行业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且这种制度优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方向来实现;邱斌等^[19]、孙少勤等^[20]研究得出,制度因素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对异质性行业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并指出,制度比较优势是我国可以塑造的新型出口比较优势。这些国内研究大都是基于中国情境而展开,与 Levchenko^[7]、Constinot^[9]、Chor^[10]等研究在内在逻辑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相关研究更多的是从一国总体层面和行业层面来考察“制度与贸易”这个主题,但缺乏基于中国情境下微观层面的深入考察,更没有针对性地考察不同类型企业对外

出口如何受本地制度环境的影响, 本文将丰富相关研究。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一) 模型设计

参考 Egger and Kesina^[21] 等研究, 构建如下 Probit 模型:

$$Pr(EXP_{i,j,s,t} = 1) = \delta_0 + \delta_1 \times Inst_{i,j,s,t} + \Phi \times f_{i,j,s,t} + \varphi_s + \gamma_t + \mu_{i,j,t} \quad (1)$$

其中 i, j, s, t 分别为企业、省份、行业和年份 EXP 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企业出口 $EXP = 1$; 反之 $EXP = 0$) $Pr(\cdot)$ 为企业出口的概率 $Inst$ 为省份层面的本地制度环境, f 为控制变量 δ_0, δ_1, Φ 为系数 φ_s 和 γ_t 分别为行业效应和年份效应 $\mu_{i,j,t}$ 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的微观数据均来自于 2005—2007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省份层面数据来自于中国及各个省份统计年鉴等^①。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区间数据进行分析, 主要基于如下两点: 第一, 2005 年, 我国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 开始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有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第二,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外部需求的急剧滑坡导致我国企业对外出口受挫, 大量出口企业迎来“倒逼潮”。因此, 2005—2007 年是我国企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同一情境下, 在此时间段进行分析可以避免较大的外部冲击给实证结果带来的偏误。基于已有的研究, 相关变量选取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在 Probit 模型设定中,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是否出口的二元变量。当企业出口规模大于零时, 被解释变量为 1; 否则, 被解释变量为 0。

2. 核心解释变量。主要从总体制度效率($Inst_Eff$) 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nst_IRP$) 两个角度来刻画地区制度环境。

(1) 关于总体制度效率的测算。借鉴孙宁华和曾磊^[22] 的做法,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采用财政制度环境、产权制度环境、市场化制度环境、贸易制度环境和外资引入制度环境等五个维度的“事后”指标来综合刻画地区总体制度效率。其中, 财政制度环境, 用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表示, 该指标越大, 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 产权制度环境, 用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市场化制度环境, 用樊纲等^[23] 的市场化进程指数衡量; 贸易制度环境, 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比重表示; 外资引入制度环境, 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GDP 比重表示。最后, 对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制度环境得分进行 0~1 标准化处理。

(2)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参考 Ginarte and Park^[24]、韩玉雄和李怀祖^[25] 等研究, 采用如下公式测算:

$$Inst_IRP_j(t) = p^{GP}(t) \times H_j(t) \quad (2)$$

其中 t, j 分别为年份、省份, $Inst_IRP_j(t)$ 为 t 年 j 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p^{GP}(t)$ 为采用 Ginarte and Park^[24] 方法测算的 t 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立法强度), $H_j(t)$ 为在韩玉雄和李怀祖^[25] 方法的基础上, 对 j 省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进行的综合测算(执法效率)。最后, 通过“立法强度 × 执法效率”, 得出省份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测算一国总体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代表性研究是 Ginarte and Park^[24] (也称为 G-P 指数法), 在测算过程中, 该研究设计了保护覆盖范围、是否为国际条约成员、针对权利丧失的保护、执法措施以及保护期限等 5 类一级指标, 并在每个一级指标下设置若干二级指标, 基于二级指标的内涵界定将每个二级指标得分设定在 0~1 之间, 并将相对应的二级指标分值加总平均得出一级指标分值, 最后把各一级指标的得分加总, 即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该指标较为全面深入地刻画了一国总体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强度”。但是, 对于司法体系仍需不断完善和执法力度仍需逐步强化的转型经济体而言, 实际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还取决于对“立法强度”的实际执行力度^[25]。

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25],各个省份“执法效率”测算如下:

$$H_j(t) = \sum_{n=1}^N h_j^n(t) \quad (3)$$

其中 t 为年份 j 为省份 n 、 N 、 h 分别为测度执法效率的具体维度、维度数量、某一维度指标得分。具体测算时,采用人均 GDP、成人识字率、律师比例、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时间以及是否为 WTO 成员等 5 个维度指标,以综合衡量“执法效率”。最后,通过“立法强度 × 执法效率”,就可以测算得出各个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3. 控制变量。参考马光荣和李力行^[16]、盛斌和陈帅^[26]、刘晴等^[27] 研究,控制变量具体包括:(1) 企业生产率(tfp_lp)。该变量采用 Levinsohn and Petrin^[28] 的半参数方法来估算。在测算 TFP 时,产出现工业增加值表示,劳动投入用全年平均职工数表示,资本投入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中间投入用中间投入总额表示。(2) 企业规模($size$)。该变量采用“企业总产出的自然对数”来衡量。(3) 工资水平($wage$)。该变量采用“企业工资总额/员工数量”来衡量。(4) 政府补贴(sub)。该变量采用“补贴收入/工业总产值”来衡量。(5) 税收(tax)。该变量采用“应交增值税额/工业总产值”来衡量。(6) 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该变量采用实收资本中的外商资本比重($foreign$) 和国有资本比重($state$) 来衡量。(7) 地区经济发展程度(Non_S)。该变量采用“地区私营企业的总资产/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资产”来衡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变量测算所涉及的名义值均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而转化为相应的实际值。表 1 较为详细地展示实证分析的相关变量的含义、衡量方法及数据来源。

表 1 相关指标说明

变量	含义	衡量方法	数据来源
EXP	企业是否出口	企业出口,取值 1,企业不出口,取值 0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tfp_lp	企业生产率	LP 方法计算所得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size$	企业规模	工业总产值的自然对数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wage$	工资水平	企业工资总额/员工数量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sub	补贴程度	补贴收入/工业总产值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tax	税收水平	增值税总额/工业总产值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foreign$	外资参与程度	外商资本/实收资本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state$	国有资本参与程度	国有资本/实收资本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Non_S	省份层面的经济发展程度	地区私营企业的总资产/规模以上企业的总资产	《中国统计年鉴》
$Inst_Eff$	总体制度效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	《中国统计年鉴》
$Inst_IRP$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采用韩玉雄和李怀祖 ^[25] 对 Ginarte and Park ^[24] 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进行修正的方法测算	《中国法律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TO 网站、World Bank 数据库
$open1992$	开埠历史时长	截止到 1992 年 1 月 1 日各省份的开埠历史时长(以年份计)的自然对数	董志强等 ^[29]

数据来源:作者的整理和汇总。

(三) 样本数据说明

参考马光荣和李力行^[16]、刘晴等^[27] 等做法,对原始数据制定如下剔除标准:(1) 剔除关键指标缺失(如总资产、员工人数、工业销售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工业增加值等)的企业;(2) 剔除关键指标出现不合理值(如工业增加值、工业销售产值或出口交货值为负值)的企业;(3) 剔除职工人数少于 8 人的企业,因为大多数异常值都是源于这些没有可靠会计系统的个体经营者;(4) 剔除处于破产、筹建等异常营业状态的企业;(5) 剔除出现明显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观察值的企业(如报告的流动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高于总资产,或者累计折旧小于当期折旧);(6) 以利润为标准,剔除利润最高和最低 2.5% 的企业样本,进一步消除大量的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最后,选择行业二位码编号为 13~42 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数据,共计 460 407 个企业信息。

四、实证分析

本节将实证分析本地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并考察上述影响在异质性企业中可

能表现出的差异性特征。为了克服估计的内生性问题,借鉴董志强等^[29]研究,选择截止到1992年各省份开埠历史时长的自然对数(*open1992*)作为本地制度环境的工具变量^②。其原因如下:第一,1992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启之年,1992年各省份制度环境可视为各地区制度改革的初始基础,改革初始时期中拥有更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的省份无疑在后续的市场经济推进和制度深化改革历程中,更容易吸收、消化和贯彻新的制度法规并形成更加良好的制度环境^[30]。第二,采用截止到1992年各个省份开埠历史时长,可用于说明各个省份受西方影响的强弱,而向西方学习更多、受西方影响更大的地区有着更强的市场经济观念及意识,这也就更容易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29]③。由于制度的延续性,各省份历史时期制度环境及受西方影响的程度会影响目前的制度环境水平,而当前的企业出口行为显然不会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

(一) 基准回归分析

首先,从总体上考察本地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出口的经验影响,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得出,两类本地制度环境均显著促进企业对外出口,而且不考虑估计的内生性将会低估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正向影响程度。一方面,拥有更高的总体制度效率的地区意味着该地区企业生产运行有着更为完备的制度体系,这将降低企业生产和运营中可能存在的各种不确定性,进而减少企业生产运营的各类交易成本并强化企业市场竞争力,进而有助于企业对外出口。而且,总体制度效率更高的地区往往意味着该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更高及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将“倒逼”企业提升自身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总体制度环境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	(3)	(4)	(5)	(6)
<i>Inst</i>	0.861*** (60.88)	0.869*** (64.04)	1.745*** (58.66)	0.190*** (23.96)	0.219*** (21.74)	1.018*** (57.85)
<i>tfp_lp</i>	-0.169*** (-39.56)	-0.168*** (-39.40)	-0.131*** (-29.65)	-0.198*** (-46.46)	-0.199*** (-46.69)	-0.164*** (-38.19)
<i>size</i>	0.321*** (78.54)	0.321*** (78.50)	0.305*** (74.30)	0.333*** (81.38)	0.333*** (81.47)	0.318*** (78.29)
<i>wage</i>	0.002*** (9.30)	0.002*** (8.48)	-0.000** (-2.24)	0.003*** (16.06)	0.003*** (16.40)	-0.000** (-2.03)
<i>sub</i>	-1.256*** (-3.91)	-1.248*** (-3.89)	-1.221*** (-3.92)	-1.048*** (-3.69)	-1.040*** (-3.68)	-0.959*** (-3.55)
<i>tax</i>	-4.168*** (-40.62)	-4.172*** (-40.71)	-4.042*** (-40.20)	-4.006*** (-39.56)	-3.999*** (-39.52)	-3.795*** (-39.10)
<i>foreign</i>	1.102*** (115.98)	1.100*** (115.68)	1.059*** (109.90)	1.114*** (116.57)	1.115*** (116.63)	1.005*** (102.25)
<i>state</i>	-0.068*** (-3.74)	-0.068*** (-3.72)	-0.053*** (-2.92)	-0.080*** (-4.38)	-0.081*** (-4.44)	-0.046*** (-2.58)
<i>Non_S</i>	1.177*** (64.79)	1.209*** (67.98)	0.607*** (24.46)	1.768*** (103.16)	1.765*** (102.96)	1.884*** (112.33)
<i>C</i>	-4.227*** (-148.42)	-4.221*** (-148.10)	-4.282*** (-151.06)	-4.203*** (-147.01)	-4.198*** (-146.89)	-4.324*** (-154.22)
行业效应	Y	Y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Y	Y
观察值	460 407	460 407	460 407	460 407	460 407	460 407
$\hat{\delta}_{Inst}$	0.106***	0.106***	0.791***	0.033***	0.030***	0.646***

注:(1)和(4)列为当期制度环境的估计结果,(2)和(5)列为滞后一期制度环境的回归结果,(3)和(6)列为IV估计的估计结果。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对应的t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置信水平。

的竞争力来获得广阔的生存空间和良好的发展空间,进而使得该地区的企业出口概率更高。另一方面,拥有更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能够得到更大的制度激励,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更强,这将有助于强化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这表明,伴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由制度变革和体制调整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是可以在企业出口层面得到体现的:本地制度环境是影响市场经济在资源优化配置方面能否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企业能否获得持续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为了准确比较不同类型的本地制度环境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需要测算本地制度环境变量

(*Inst*) 的标准化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hat{\delta}_{Inst} = \delta_{Inst} \times \frac{sd(Inst)}{sd(EXP)} \quad (4)$$

其中 δ_{Inst} 和 $\hat{\delta}_{Inst}$ 分别为原始的估计系数(边际效用)和标准化的估计系数。*Inst* 为本地制度环境变量, *EXP* 为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 $sd(\cdot)$ 为变量的标准差。相应的计算结果,见表 2 最后一行。由表 2 可以得出,相比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总体制度效率对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程度更大。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总体制度环境效率是对地区制度环境的一般化测度,是对企业生存、成长和发展起到最为基础性、覆盖范围更广泛的制度因素^[35],其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运营和销售的各类交易成本,所以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更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制度体系中一个重要维度,只有那些生产的产品具有明显知识产权属性的企业(如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才会较大程度上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的影响,但现实中很多中国企业主要从事组装加工类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其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诉求并不强烈,这也使得从总体层面来看,相比于总体制度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程度更小。

从表 2 中,还可得出:(1)生产率(*tfp_lp*)对企业出口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与邱斌和闫志俊^[36]的研究是一致的,即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对于中国而言,大量加工贸易的存在使得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也能够参与出口,加工企业一般具有明确的出口渠道,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出口偏向性政策”(如出口退税、融资扶持等),将使该类企业的出口固定成本更低^[37]。(2)企业规模(*size*)对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显著为正,这符合新贸易理论的经典论断,即规模更大的企业将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生产成本更低,更有利于其对外出口。(3)工资水平(*wage*)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参考 IV 估计结果),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特征所决定的劳动比较优势。(4)政府补贴(*sub*)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在于,获得政府补贴收入更高的企业往往隶属于幼稚产业企业或是政府重点支持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这类企业本身的“自生能力”是不足的;还有一种悲观的情况是,过度依赖政府补贴的企业并没有置于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优胜劣汰”的锤炼,甚至企业的生产和运营长期依赖于政府的扶持,这使得这类企业很难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38]。王永进等^[38]关于“中国大企业缺失之谜”的研究中得出,受政府扶植和补贴的企业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在长期中会造成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进行技术创新并阻碍这些企业的进一步成长。(5)税收(*tax*)对企业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过高的税收负担会弱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对企业出口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6)国有资本参与(*state*)对于企业出口决策会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资本参与(*foreign*)对于企业出口决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中国现实特征也极为吻合,国有企业在其垄断势力的庇佑下,销售活动更多集中于国内市场而出口动力不足;而外资企业利用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动机更强,更容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很多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用工成本相对较低、技能相对熟练的劳动力资源而将全球生产装配中心放置在中国并向世界出口。(7)企业所在省份的非国有经济更为发达(*Non_S*),则企业的出口概率更高。非国有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意味着该地区的市场竞争机制更能发挥主导作用,这将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强化存活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 区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分组分析

马光荣和李力行^[16]研究得出,制度效率对企业退出存在不同生产效率企业层面的“筛选效应”。就本研究而言,本地制度环境对不同生产率企业出口影响也可能表现出一定的“筛选效应”。基于这种考虑,将所有企业按照生产率高低进行排序,按照企业生产率与中位数生产率之间的大小关系将总体样本划分为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并分别进行估计,主要结果见表 3。表 3 最后一行汇报了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标准化系数。限于篇幅,对于非核心变量回归结果,将不再汇报和赘述^④。

从表 3 可得出:首先,本地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出口的正向影响在两个样本组中均通过 1% 显著性水平上的检验,这再次验证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之于企业对外出口的重要作用。其次,在测算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出口的标准化系数后,可得出,相较于知

表 3 区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结果

	低生产率企业				高生产率企业			
	总体制度环境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总体制度环境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	(3)	(4)	(5)	(6)	(7)	(8)
<i>Inst</i>	0.670 *** (33.11)	1.541 *** (31.80)	0.064 *** (4.19)	0.807 *** (30.17)	1.000 *** (53.46)	1.884 *** (49.82)	0.346 *** (24.97)	1.189 *** (49.90)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行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Y	Y	Y	Y
观察值	230 323	230 323	230 323	230 323	230 084	230 084	230 084	230 084
$\hat{\delta}_{inst}$	0.080 ***	0.701 ***	0.009 ***	0.525 ***	0.124 ***	0.847 ***	0.047 ***	0.738 ***

注:(1)、(3)、(5)和(7)列为滞后一期制度环境的估计结果,(2)、(4)、(6)和(8)列为 IV 的估计结果。系数下的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对应的 t 值,*、**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置信水平。

识产权保护强度,总体制度效率对企业出口的正向影响更大,这一结论在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中均得到证实。而且,还可发现,相比于低生产率企业,总体制度效率对高生产率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更大,即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外出口存在不同生产效率企业层面的“筛选效应”。异质性贸易理论认为,企业对外出口将会导致资源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转移,而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将强化这一作用渠道,这与马光荣和李立行^[16]研究是一致的。

(三) 区分制造业行业类型的分组分析

由于不同制造业行业的自身特征和要素投入结构是存在较大差异的,参考刘修岩等^[39]的分类,将总体样本划分为现代制造业行业企业和传统制造业行业企业,其中,现代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27),专用设备制造业(3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40),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41),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42),其他行业划分为传统制造业行业,再次进行估计,主要结果见表 4。

从表 4 得出,本地制度环境对两类制造业行业企业对外出口均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表 4 最后一行所汇报的本地制度环境的标准化系数可得出,相比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总体制度效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更大,这一结论在两类样本中再次得以验

表 4 区分制造业类型的回归结果

	现代制造业企业				传统制造业企业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	(3)	(4)	(5)	(6)	(7)	(8)
<i>Inst</i>	1.033 *** (31.38)	2.168 *** (31.49)	0.344 *** (14.68)	1.194 *** (31.26)	0.841 *** (56.33)	1.659 *** (50.36)	0.195 *** (17.43)	0.981 *** (49.58)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行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Y	Y	Y	Y
观察值	76 143	76 143	76 143	76 143	384 264	384 264	384 264	384 264
$\hat{\delta}_{inst}$	0.125 ***	0.933 ***	0.051 ***	0.785 ***	0.103 ***	0.761 ***	0.026 ***	0.618 ***

注:(1)、(3)、(5)和(7)列为滞后一期制度环境的估计结果,(2)、(4)、(6)和(8)列为 IV 的估计结果。系数下的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对应的 t 值,*、**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置信水平。

证;而且,相比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现代制造业企业对于本地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大。可能的原因在于:相较于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自身行业特点包括技术水平和研发强度更高、上下游联系更为密切、生产链条和产品工艺更为复杂等,这就使得这类行业企业的生产对于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依赖性更高^[7]。区分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分组分析结果和区分制造业行业类型的分组分析结果共同表明,高生产率企业、现代制造业企业发展对于总体制度环境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均有着强烈的内在诉求。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企业高质量发展、“高质量产品供给体系”建立均要以外

部的制度变革和体制改善优化所营造的良好制度环境为前提和基础,而且不断完善和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也能够进一步促进上述目标的快速实现,这些本地制度环境优化的外溢效应可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型“制度红利”。

(四) 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分组分析

考虑到企业的所有制类型与企业是否对外出口可能存在较大的关联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权差异的重要影响,将总体样本按注册类型不同,划分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再次进行估计,主要结果见表5。

表5 区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回归结果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	(3)	(4)	(5)	(6)	(7)	(8)
<i>Inst</i>	0.496*** (21.05)	-0.041 (-0.72)	0.032* (1.77)	-0.052* (-1.66)	1.014*** (59.27)	2.108*** (60.48)	0.311*** (24.71)	1.305*** (60.69)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行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Y	Y	Y	Y
观察值	190 484	190 484	190 484	190 484	269 272	269 272	269 272	269 272
$\hat{\delta}_{Inst}$	0.059***	-0.022	0.004*	-0.038*	0.127***	0.898***	0.044***	0.788***

注:(1)、(3)、(5)和(7)列为滞后一期制度环境的估计结果,(2)、(4)、(6)和(8)列为IV的估计结果。系数下的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对应的t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置信水平。

表5最后一行汇报了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标准化系数。

从表5可得出,考虑内生性的估计结果表明,本地制度环境会显著促进外资企业对外出口,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并未能促进(甚至会阻碍)内资企业对外出口;相比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对外出口对于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大。从内在机理来看,本地制度环境通过直接影响企业生产和运营的各种交易成本,进而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塑造和培育起到基础性作用。而从现实来看,内资企业普遍存在企业主体的法律意识薄弱、契约关系得不到有效执行等问题,本地制度环境对企业竞争力塑造的重要作用尚未在内资企业得以体现;而且,大部分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研发投入强度较低,产品的“知识产权”含量较低,尤其是不少内资企业主要依靠“创造性模仿”来获得出口优势,这使得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将阻碍内资企业出口行为。而处于跨国公司某一环节的外资企业本身属于具有较高研发水平的企业,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敏感程度更高,其发展在不确定性更大的东道国市场对于当地正式制度完善性存在强烈的内在诉求^[40]。此外,内资企业对外出口还可能是较差的本地制度环境下企业“寻租”的结果,国家“出口偏向性政策”可能导致市场机制失灵,进而使得内资企业陷入“低制度环境→企业寻租兴起→企业出口→企业获得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惠→企业得以生存”的恶性循环^[37];而外资企业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动机更强,出口倾向更高,而且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将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动机。

(五) 区分不同地区企业的分组分析

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及制度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性,为了进一步考察地区差异对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将总体样本按照企业所属地区,划分为东部地区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再次进行估计,主要结果见表6。表6最后一行汇报了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标准化系数。

在表6中,可以得出,本地制度环境对东部地区企业对外出口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总体制度效率对其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其出口将会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可能原因在于:一方面,尽管我国总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已经较为完善,但是中西部地区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执行效率偏低使得其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要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企业尚处于“创造性模仿”阶段,当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逐步提升时,其对该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可能产生“倒U”型影响,适度偏低的知识产权保护则有助于企业对外出口^{[20]⑤}。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经验结果并非意味着,现阶段中西部地区需要弱化对知识产权的实

际保护强度,恰恰相反,对于创新能力水平偏低、“创造性模仿”能力较为突出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微观层面的企业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为前提和支撑,并以当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适度跨越“创造性模仿”阶段,尽管这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出口企业减少、出口份额萎缩等负向冲击,但这种“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阵痛”是中西部地区跨越“低端锁定”必须经历的特殊阶段。

(六) 稳健性分析

为了论证上述结果的可信性,本文还采用两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即替换本地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以及基于单一年份样本进行再估计。关于第一种方法,采取市场化进程指数衡量总体制度效率,知识产权保护指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相关数据直接来自樊纲等^[23]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主要估计结果见表7;关于第二种方法,考虑到所使用的工具变量的时不变特征^⑥,参考黄新飞等^[32]采用2005年、2006年、2007年三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分别进行再估计,主要估计结果见表8。从表7和表8的主要结果来看,均与上文分析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考察本地制度环境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出口的经验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在不同类别企业中所表现出的差异化特征。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总体来看,本地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对外出口的关键因素,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可以成为我国出口优势重塑的内在驱动力;第二,相

比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总体制度效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第三,从不同类别企业来看,高生产率企业、现代制造业企业、外资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对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大;第四,知

表6 区分不同地区企业的回归结果

	东部地区企业				中西部地区企业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	(3)	(4)	(5)	(6)	(7)	(8)
<i>Inst</i>	1.052 *** (66.35)	1.792 *** (59.46)	0.315 *** (25.43)	1.027 *** (57.09)	0.380 *** (3.49)	11.760 *** (13.56)	-11.344 *** (-14.03)	-14.462 *** (-7.04)
控制变量	Y	Y	Y	Y	Y	Y	Y	Y
行业效应	Y	Y	Y	Y	Y	Y	Y	Y
时间效应	Y	Y	Y	Y	Y	Y	Y	Y
观察值	369 432	369 432	369 432	369 432	90 975	90 975	90 975	90 975
$\hat{\delta}_{Inst}$	0.113 ***	0.648 ***	0.048 ***	0.671 ***	0.016 ***	3.297 ***	-0.055 ***	-0.617 ***

注:(1)、(3)、(5)和(7)列为滞后一期制度环境的估计结果,(2)、(4)、(6)和(8)列为IV的估计结果。系数下的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对应的t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置信水平。

表7 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出口的标准化系数: 基于替换制度环境指标的估计

	总体制度效率 (替换指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替换指标)	
	(1)	(2)	(3)	(4)
	滞后一期	IV估计	滞后一期	IV估计
总体样本	0.179 ***	1.105 ***	0.128 ***	1.013 ***
低生产率企业	0.147 ***	1.057 ***	0.106 ***	1.030 ***
高生产率企业	0.195 ***	1.114 ***	0.136 ***	0.982 ***
现代制造业企业	0.198 ***	1.311 ***	0.143 ***	1.223 ***
传统制造业企业	0.176 ***	1.061 ***	0.125 ***	0.968 ***
内资企业	0.141 ***	0.006	0.089 ***	-0.041
外资企业	0.196 ***	1.192 ***	0.143 ***	1.064 ***
东部地区企业	0.163 ***	0.829 ***	0.133 ***	0.894 ***
中西部地区企业	0.024 ***	0.534 ***	-0.023 ***	-6.081 ***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置信水平。

表8 本地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出口的标准化系数: 基于单一年份的IV估计

	总体制度效率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1) 2005	(2) 2006	(3) 2007	(4) 2005	(5) 2006	(6) 2007
	总体样本	0.699 ***	0.752 ***	0.841 ***	0.628 ***	0.630 ***
低生产率企业	0.686 ***	0.633 ***	0.665 ***	0.568 ***	0.479 ***	0.458 ***
高生产率企业	0.732 ***	0.816 ***	0.911 ***	0.725 ***	0.738 ***	0.714 ***
现代制造业企业	0.817 ***	0.877 ***	1.017 ***	0.753 ***	0.755 ***	0.791 ***
传统制造业企业	0.675 ***	0.724 ***	0.804 ***	0.604 ***	0.602 ***	0.595 ***
内资企业	0.095 **	-0.069	-0.134 **	0.066 *	-0.077 **	-0.112 ***
外资企业	0.764 ***	0.875 ***	0.978 ***	0.757 ***	0.793 ***	0.771 ***
东部地区企业	0.542 ***	0.626 ***	0.684 ***	0.618 ***	0.685 ***	0.662 ***
中西部地区企业	-2.666 ***	1.634 ***	1.958 ***	-0.616 ***	-0.461 ***	-0.511 ***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置信水平。

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企业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影响并不显著甚至是负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在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由制度变革和体制调整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是可以在企业出口层面得到体现的:本地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能否获得出口竞争力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结论,可得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可以通过培育和建设更加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出口增长注入内生发展动力。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态势日益加剧,我国企业出口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加之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正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通过本地制度环境优化并不断释放“制度红利”,进而引导微观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于我国而言,应在更大区域内坚持公平、高效的制度体系建设,积极构建企业能够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动态机制,为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方面起到主导性作用扫除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障碍因素,同时要借助于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不断探索企业出口便利化方面的规范性政策,从市场准入、海关监管和检查免疫等方面着手进行相关旧体制改革和新制度建设。

第二,需要充分把握和准确认识本地制度环境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差异化影响。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其现实生存环境和下一步向何处发展将直接决定我国整体经济的具体走向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路径。本文研究表明,除了关注企业自身的动态发展以外,构建良好的本地制度环境将有助于承担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重任的高生产率企业、现代制造业企业、东部企业等类型企业的良好发展和市场竞争力塑造。政府可以集中关注制度体系完善化建设,强化制度执行效率,并在充分认识企业的生产状况及其对制度性、法规性的规章制度的内在诉求的基础上,制定并实施灵活的行政性规章制度来促进那些更加需要良好本地制度环境的现代制造业企业的发展 and 对外出口。

第三,要注重我国内资企业和中西部企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稳步推进构建相适宜的制度环境来引领其进行转型和升级。一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应综合考虑我国制造业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及产业竞争力等因素,在推进我国制度完善不断提升的基础上,可以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的行政法规和文件来引导和鼓励内资企业从事研发创新活动,以激活内资企业的创新动力,这将有助于在客观上引导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和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需要建设与各地区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更加匹配的法律法规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执行效率,并疏通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竞争力形成的作用渠道。

注释:

- 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西藏的相关数据缺失严重,本文实证分析数据并不包含西藏。
- ②从理论逻辑来看,由于本文实证考察的是企业出口行为,而核心解释变量则是省份层面的制度环境,企业出口行为对本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这使得本文实证分析中由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双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为了进一步增强估计结果的无偏性,本文仍然进行IV估计。
- ③从历史和地理两个视角寻找制度的工具变量,是现有文献研究中一个主要思路。从历史角度寻找制度工具变量的代表性文献如下:Acemoglu *et al.*^[31],董志强等^[29],黄新飞等^[32];从地理角度寻找制度工具变量的代表性文献如下:Hall and Jones^[33],Easterly and Levine^[34]等。
- ④在分样本回归结果中,非核心变量结果大都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而且对非核心变量的估计结果解释在“基准回归分析”部分已经给予较为充分的论证,分样本回归分析将不再对此进行赘述。
- ⑤为了验证这一论断,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的平方项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分析,基于IV估计的实证结果显示,上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平方项的回归系数是显著为负的。在此基础上可推算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出口而言的“最适强度”为0.027,而2007年中西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0.034)已经超过这一强度。因此,上述论断得以验证。

⑥采用制度的时不变工具变量是现有文献的普遍做法,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IV的外生性,如Acemoglu *et al.*^[31]、董志强等^[29]等。

参考文献:

- [1] NUNN N, TREFLER D. Domestic institutions as a sourc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3, No. 18851.
- [2] HELPMAN E.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3] CORCOS G, IRAC D M, MION G,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intrafirm trade: evidence from French firm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3, 95(3): 825-838.
- [4] 易先忠, 欧阳晓, 傅晓岚. 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 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J]. 经济研究, 2014(6): 18-29.
- [5] 张杰, 郑文平.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J]. 经济研究, 2017(3): 151-165.
- [6] 逯东, 朱丽. 市场化程度、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J]. 产业经济研究, 2018(2): 65-77.
- [7] LEVCHENKO A A.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3): 791-819.
- [8] NUNN N. Relationship-specificity, incomplete contract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22(2): 569-600.
- [9] COSTINOT A. On the origi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9, 77(2): 255-264.
- [10] CHOR D. Unpacking sourc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82(2): 152-167.
- [11] ACEMOGLU D, ANTRÀS P, HELPMAN E. Contracts and technology adop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3): 916-943.
- [12] 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 80(2): 711-744.
- [13]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3): 1131-1150.
- [14] LA PORTA R, LOPEZ-DE-SILANES F, SHLEIFER A, et al. Law and fina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1113-1155.
- [15] CHANEY T. Liquidity constrained exporters [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2016, 72: 141-154.
- [16] 马关荣, 李力行. 金融契约效率、企业退出与资源误置[J]. 世界经济, 2014(10): 77-103.
- [17] 李坤望, 王永进. 契约执行效率与地区出口绩效差异——基于行业特征的经验分析[J]. 经济学(季刊), 2010(3): 1007-1028.
- [18] 黄玖立, 吴敏, 包群. 经济特区、契约制度与比较优势[J]. 管理世界, 2013(11): 28-38.
- [19] 邱斌, 唐保庆, 孙少勤, 等. 要素禀赋、制度红利与新型出口比较优势[J]. 经济研究, 2014(8): 107-119.
- [20] 孙少勤, 邱斌, 唐保庆. 法制建设强度与中国制造业出口动力新源泉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7): 84-95.
- [21] EGGER P, KESINA M.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exports: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ms [J]. Cesifo economic studies, 2013, 59(4): 676-706.
- [22] 孙宁华, 曾磊. 间歇式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波动: 校准模型与动态分析[J]. 管理世界, 2013(12): 22-31.
- [23] 樊纲, 王小鲁, 朱恒鹏. 中国市场化指数: 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24] GINARTE J C, PARK W G. 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 [J]. Research policy, 1997, 26(3): 283-301.
- [25] 韩玉雄, 李怀祖.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05(3): 377-382.
- [26] 盛斌, 陈帅. 全球价值链、企业异质性与企业的成本加成[J]. 产业经济研究, 2017(4): 1-16.
- [27] 刘晴, 程玲, 邵智, 等. 融资约束、出口模式与外贸转型升级[J]. 经济研究, 2017(5): 75-88.
- [28] 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 [J]. Review of

-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2) : 317-341.
- [29]董志强 魏下海 苏灿晴. 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 管理世界 , 2012(4) : 9-20.
- [30]吴超鹏 唐药.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J]. 经济研究 2016(11) : 125-139.
- [31]ACEMOGLU D ,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 1369-1401.
- [32]黄新飞 舒元 徐裕敏.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J]. 经济研究 2013(9) : 4-16.
- [33]HALL R E , JONES C I.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 83-116.
- [34]EASTERLY W , LEVINE R. Tropics , germs , and crops: how endowments influ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50(1) : 3-39.
- [35]RODRIG D , SUBRAMANIAN A , TREBBI F. Institution rule: the primacy of institutions over geography and integr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 NBER working paper ,2002 ,No. 9305.
- [36]邱斌 闫志俊. 异质性出口固定成本、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决策[J]. 经济研究 2015(9) : 142-155.
- [37]钱学锋 毛海涛 徐小聪. 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2) : 83-108.
- [38]王永进 盛丹 李坤望. 中国企业成长中的规模分布——基于大企业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3) : 26-47.
- [39]刘修岩 易博杰 邵军. 示范还是挤出? FDI 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溢出的实证研究[J]. 世界经济文汇 , 2011(5) : 106-120.
- [40]ARAUJO L , MION G , ORNELAS E. Institutions and export dynamic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6(98) : 2-20.

(责任编辑: 禾 日)

The influence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export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WU Feifei , ZHANG Xia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Hefei 230601 ,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 two indicators namely the efficiency of overall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intensity , are constructed to measure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 and then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export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i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 the optimization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ll help to promote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export , and thus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be on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pendence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 export on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export of high-productivity enterprises ,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 moder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eastern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more dependent on the favorabl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become a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Based on this ,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institutional dividend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ich policy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teadil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 and can provide certain path references for China to promot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nterprise export; institutional divide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supply-side reform